

清华近代史论集

思想、学术及其他

本书编委会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近代史论集

思想、学术及其他

本书编委会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学术及其他/《思想、学术及其他》编委会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清华近代史论集)

ISBN 978-7-302-44770-2

I. ①思… II. ①思… III. ①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集 ②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集 IV. ①B25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9961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晓华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24.5 字 数:408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产品编号:071345-01

卷首语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十余篇论文，是从清华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已发表的论文中抽取出来的。这些论文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清华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和面貌，但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学术传承的独特风格。这个学术传承的独特风格就是多年来在刘桂生、何兆武两位先生指导、熏染下所形成的学术风格。清华自1985年起招收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其主攻方向实际上是在刘桂生、何兆武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后来复建历史系、设立专门史博士点，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凝聚。自觉接受刘、何二先生长期影响的一群教师，逐渐走上了一定的学术轨道。现在回想起来，两位先生就治学方面之所教导，使我们印象深刻、并已尽力化为行动者，大致是如下一个脉络：要做“一线学者”，必须从目录、索引入手，弄清所欲研究对象已被研究的来龙去脉，经比对、辨析，发现真问题、新问题和意义较深远的重要问题，再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或关键点，在系统研读资料的前提下，以哲学的眼光，借用语言学的方法，重视语境、语际、语源、语意的深入开掘，分清表里，洞悉异同，准确把握其言说对象，通过考察注释、融会贯通，力求与古人神交意

会，同情了解。欲其如此，时空上自必古今中外，学科上自必交叉兼顾。方法上惟其如此，方可出“稳、准、狠”的综合效应，实现一步一足迹，一花一果实的真正目标。

学问无分中西古今，亦无须在意其有用无用。学问之本质在求实求通，要害在方法之雅正与否，不同的只是研究之对象而已。

这本小小的论集，编者的主旨是想对刘、何二师所传承之学术风格有所发扬。但是，我们很清醒地自知离刘、何二师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编 者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I
“历史要重演吗?” ——1948 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 欧阳军喜	1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 王宪明	25
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19 世纪前中期的三种“民族”观念及其可能的 思想来源 王宪明 岳秀坤	44
也说“羊城之会” ——兼论康有为今文学的形成 董士伟	71
学术与政治的纠结 ——梁任公《近世之学术》读解 张 勇	79
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 戚学民	119
戊戌后康有为的文化思想与活动 董士伟	139
辛亥革命期间列强对华中立政策研究 舒 文	182
一本较早论述辛亥革命教训的稀见书《失败》 及其著者 蔡乐苏	211

论国民党主要派别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研究	舒文	227
蒋廷黻学术思想之理论基础初探	蔡乐苏	246
历史场景与言外之意		
——也说“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张勇	268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		
——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欧阳军喜	309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戚学民	333
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李蕉	367

“历史要重演吗?” ——1948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

欧阳军喜

“历史要重演吗?” 1948年初,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在独立时论社特约各报上发表了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提出了这关系重大的一问。周鲠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可能会导致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从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政策的覆辙。随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发表了一封给周鲠生的公开信,为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辩护,并认为苏联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对于胡适的反驳,周鲠生再次作出了回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之中,或同情周鲠生,或支持胡适,演成一场关于国际形势的大论战。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周、胡之争。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国际局势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它是中国知识界内部分化的产物,同时又加剧了这种分化的趋势,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走向。学界对这场争论研究不多,对这一争论所蕴含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① 本文认为,1948年的周、胡之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而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试申其义。

^①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智效民:《一九四八年的争论与胡适对苏联的认识过程》,《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第47卷第2期,2009年6月,157~190页;张忠栋:《胡适五论》,249~250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1994年6月,253页。

一、论争与焦点

胡适与周鲠生是一对相交多年相知甚深的老朋友。1922年蔡元培聘请周鲠生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其时胡适也在北大任教，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1938年9月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周鲠生也因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赴美。会后周鲠生应胡适之请，留在大使馆任职，协助胡适处理外交事务，直到胡适任职期满。在华盛顿的三年间，周鲠生是胡适的座上客，几乎每天他们都要讨论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未来的和平问题。^①那时他们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也大体一致，^②但是这一次，这两位老友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直接引发这场争论的，是周鲠生的《历史要重演吗？》一文^③。周氏自称写作此文的主要动因是担心“日本的卷土重来”，人类会“再遭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④胡适在看了周鲠生的文章后，对这位老朋友的观点颇感“惊讶”，于是花了四天的时间，给周鲠生写了一封长信。^⑤胡适写完此信后，也寄给了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王世杰意识到“适之自此将开始‘反苏’之论战”^⑥。2月1日，胡适此信也在独

① Hu Shih, “Foreword”, in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By S. R. Chow,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44.

② *Ibid.* 那时周、胡之间的唯一分歧，就是周鲠生主张战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安全机构，而胡适则认为，在建立了世界性的安全机构之后，这样的地区性的机构既无必要，也会导致两大机构间功能上的混乱及不必要的浪费。

③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11日，第1、4版。该文随后转载于1948年1月29日的《北平时报》，1948年2月16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第21期，1948年2月29日出版的《中央周刊》第10卷第9期等。

④ 《周鲠生致胡适》（1948年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 胡适此信始写于1948年1月15日，至1月19日写完。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701、7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⑥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16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立时论社特约各报上同时刊出^①，立即引起各方的关注。青年党主席曾琦两次发表谈话，以示对胡适的响应。^②一些胡适的追随者，更是希望言论界对“甚么是侵略势力”与“苏俄是不是一个新的可怕的侵略势力”这样的问题，也像科学与玄学之争那样，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③随后，各地继起响应的也不少。2月底，《中央周刊》把从北平、武汉、南京三地收集到的11篇评论文章，连同周、胡俩人的原文，编成“关于周鲠生胡适之的论战”专辑发表，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论争已完全超出了周、胡俩位友人之间的探讨，而演变成一场波及政学两界的大论战。

周、胡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第二，苏联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今日对德对日和约问题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两国的复兴，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战时这两个强敌以抵制其他一个战胜的盟国。”胡适则断定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周鲠生认为“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胡适则认定“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④。这是他们俩人不同的意见，也是这场争论的焦点。

关于战后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周鲠生就明确主张战后应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他提醒西方各盟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仅过了20年，又复兴成为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应成为战后联合国家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一

① 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胡适此文于1948年2月1日在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上同时刊出。随后又转载于1948年2月6日出版的《周论》第1卷第4期、1948年2月16日出版的《智慧》第42期、1948年2月29日出版的《中央周刊》第10卷第9期等刊物上。

② 《曾琦致胡适》（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50~351页。

③ 《姚从吾致胡适》（1948年2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44页。

④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11日，第1、4版；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益世报》（天津），1948年2月1日，第1、4版。

个警示。^①这一次，他再次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新武装的这段历史。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方面的西方列强，在防制德国侵略势力复兴上，原来意见一致。但到了执行和约的时候，他们的政策便分歧起来。经济利益的立场、政治均势的考虑使得有的西方国家不求切实执行和约以防制敌国复兴，反而以抑制盟邦扶植敌国为国策，其结果是凡尔赛和约自始即未获彻底的有效的执行，德国逃避或解除和约条款的钳制，获得机会从事经济的军事的复兴计划。周鲠生希望这一历史不要重演，希望战胜的各盟国能够一致贯彻战时各国同意的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不但全部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且彻底消灭他们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对德对日的和约仍未达成，各国的对日对德政策出现分歧，不复能维持战时共同对敌的精神。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使议和政策不能一致，这让周鲠生颇为忧虑。他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将要重演吗？这是关系今后世界和平及人类死活之一个重大问题。在大战期中，联合国列强政治家所表示的一贯精神是要为国际永久和平根绝侵略势力。而战后厉行管制敌国，使侵略主义者不能恢复军事的经济的实力再来威胁他国，则认为联合国列强的共同责任。现在和约尚未订立，列强政策已呈分道扬镳之象。是不是又要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政策的覆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德国一败涂地，但是不到二十年，她又成为威胁欧洲乃至世界之最可怕的势力。那一个大势力的培养成功，民主国家，尤其英美不能不说是负一大部分责任。在远东方面，战前日本之强大，得力于西方列强之扶植和纵容也不小，英美尤其重视日本的力量和地位。……最值得记忆的是，西方列强原来扶植德国，意在恢复大陆均势及抵制苏联，而不意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妥协均势立破；他们原来想利用日本强大，在远东对抗苏联势力，而不意到一九四一年春间，

^① S. R. Chow,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pp. 9-10, p. 14.

西方列强最危急之时，日苏间居然订成中立协约，致一时令人感觉有日德苏形成联合阵线，共同对待西方列强之恐惧。对于西方民主社会，那个历史的教训应该是够大的了。”^①

周鲠生的这种担心其实在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存在。费孝通曾指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扶植德国，德国利用英国畏苏的心理重整了军备。英国原希望德国的武力会指向苏联，但结果却是法国的沦陷和英国的危急。他讽刺美国是个“没有历史意识的国家”，并提醒美国，扶植日本，最先遭殃的固然是中国，但美国也决难幸免。^② 王铁崖也认为，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波茨坦宣言的精神已被抛弃，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反动旧势力又开始活跃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教训如果值得重视的话，我们很容易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富强之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其富强的过程之中无疑的是得到英国的援助与美国的支持。但其结果，使英美两国的利益受打击，安全受威胁的并不是所要预防的帝俄，而是所援助与支持的日本。”^③ 可见，与周鲠生一样怀有此种忧虑的人并不少，只是周鲠生把这样一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到了公众面前。

胡适完全不认同周鲠生对时局的估计。他以“西方民主国家的负责言论与行动”为依据，断定他们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政策。他的主要依据就是由美国提出而英国附和的“四强共同制止德国武装四十年协约草案”。这一草案于1946年4月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1947年4月又由马歇尔在莫斯科会议上再次提出，但都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反对，特别是在关于德国赔偿问题上，苏联方面完全不同意美国对此项协议文字条文的解释。美国认定波茨坦协定的原意并不包括从现有生产获取赔偿的意思在内，美国担心从现有生产中获取赔偿会“使德

①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11日，第4版。

② 费孝通：《与美国箴言报论“中国或是日本”》，《费孝通文集》，第5卷，74~7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③ 王铁崖：《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观察》，第4卷第11期，1948年5月8日，5页。

国恢复自给自足经济的时间延长”，这与美国计划三年内使德国经济恢复的设想冲突。^① 苏联则极力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前此雅尔塔协定上已经准许苏联从现有生产中获取赔偿。胡适认为，美国的提案“正是要一种维持集体安全的武力来长期制止德国侵略势力的复活”，苏联应该予以承认，所谓“防制德日复兴”应该解释作尽力防制这两国的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活，并没有不许德、日两国民族在世间过和平生活的意思。他还强调，美国政府表示，同样的四十年协约可以适用到日本，因此中国大可不必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对日政策忧虑。^②

尽管周鲠生对胡适所作的“防制德、日复兴”的解释原则上赞同，但对胡适依据美国提案所作的推论并不认同。他举新近美军陆长在旧金山的演说^③为证，说明美国的对日政策确有改变的危险。^④ 在这个问题上，周鲠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钱克新指出，胡适所说的美国提案的内容，其远景就是要复兴德国为西方集团的一部分。他赞同周鲠生的观点，认为“对德日的宽容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就可以恢复他们于战后藏伏地下的侵略潜力而再驱世界于战争。”^⑤ 郭沫若、马叙伦也对胡适引以为据的美国提案作了具体分析。郭沫若认为美国的提案事实上比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都要退步，美国的用意是要“存心和苏联不合作”，推行“巨棒外交”。^⑥ 马叙伦则指出，苏联对美国的提案并没有想在根本上打消，只是提出若干修正意见。苏

① Marshall's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Mosco Conference, made in a national radio address on April 28, 1947. 见《当代文献》第6卷第4分册，1947年6月出版，第227页。

② 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益世报》（天津）1948年2月1日，第1版。

③ 美陆长宣称：“吾人欲日本扶植一民主力量，此一力量之强大稳定，足以支持其本身，且能抵抗今后远东可能发生之另一极权国之战争威胁。”《美陆长罗雅尔说明，美对日占领政策，在使日成为远东防御战略要塞》，《申报》，1948年1月8日，第3版。

④ 周鲠生：《我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答胡适之先生》，《益世报》（天津），1948年3月21日，第2版。

⑤ 钱克新：《评对国际形势的一种论调》，《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5页。

⑥ 郭沫若：《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光明报》，第1卷第1期，1948年3月1日，8页。

联的修正意见是正确的，正符合了要长期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复活的目标。^①此外，还有人列举美国方面取消赔款计划、释放战争罪犯、保存日本财阀、给予日本贷款、纵容日本法西斯势力活动等一系列“负责的言论与行动”，证明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已是不可抹煞的事实。^②

周、胡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苏联是否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尽管战后美苏之间已成对抗之局，“可是外交协商之途经并未闭塞，联合国组织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应用之和平机构。国际上现在并没有真正不能解决的争端，也还没有绝对势不两立的国家集团。我们相信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③这段话引发了胡适的一番感想。他说他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还曾一度梦想新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地步。但是近几年苏俄的行为使他改变了对它的看法：“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④对于胡适关于苏联的那一番“感想”，周鲠生表示了“十二分的同情”，但对于胡适关于“苏联已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这一观点，周鲠生则予以了反驳。他说，“苏联现今仍是联合国之一重要会员国，尚在继续参加联合国活动，苏联一天不退出联合国，我们便假定他没有放弃国际合作之路，没有关闭和平之门”^⑤。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支持者与周鲠生的支持者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两派。支持胡适的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人物，他们大多

① 马叙伦：《论胡适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群众》，第2卷第7期，1948年2月，9页。

② 胡宜之：《不要劝中国人做梦——与胡适博士论德意日管制问题》，《知识与生活》，第21期，1948年2月16日，23~24页。

③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益世报》（天津），1948年1月11日，第4版。

④ 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益世报》（天津），1948年2月1日，第1、4版。

⑤ 周鲠生：《我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答胡适之先生》，《益世报》（天津），1948年3月21日，第2版。

从“事实”出发来说明苏联已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在2月2日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就列举了包括“苏联在东欧之铁幕及扩张政策”、“苏联对德奥和约百般阻挠”、“苏联妨碍韩国统一”、“苏联破坏中苏条约”、“苏联对否决权无限制的应用”等所谓十大“事实”来证明胡适所说完全正确。^① 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也表示同意胡适的看法，并称“斯大林的领土扩张，已迈越他帝俄的祖先了”^②。另一种是知识界人士，他们大多是从“理论”出发来证明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王聿修认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的“本性”就是“扩张的”，因为“它认为非控制了全世界不算成功”^③，胡南林也认为，苏联“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野心，始终未曾放弃，亟于向外发展，打破现状，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胡适之先生的看法”^④。

与胡适的支持者一样，周鲠生的支持者也或从“理论”或从“事实”来证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就事实而言，有人指出，苏联提倡集体安全制，一再宣言要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并且痛骂“战争贩子”，说明苏联同样需要和平。况且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牺牲太大，需要休养生息，因此“苏联绝不会贸然又发动一次战争，以自招更沉重的打击”^⑤。就“理论”而言，有人指出，苏联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因此也不需要对外侵略。“世界革命之说虽甚可怕，但苏联人已不止一次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并存世界。既非势不两立，侵略战争亦无必要。”因此，把苏

① 《谁威胁世界和平？曾琦同意胡适之看法，并列举十大事实证明》，《中央日报》，1948年2月3日，第2版。

② 《陈雪屏先生说，我同意胡适之的意见》，《中央周刊》，第10卷第9期，1948年2月29日，354页。

③ 王聿修：《苏联为什么是一个侵略势力——共产主义的本质原是如此》，《中央日报》，1948年2月23日，第2版。

④ 胡南林：《历史不会重演：关于周鲠生胡适两先生的争论》，《南京中央日报周刊》，第3卷第7期，1948年2月29日，2页。

⑤ 龚琴予：《我赞成周先生的看法》，《中央周刊》，第10卷第9期，1948年2月29日，355页。

联当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完全是胡适的“恐苏病”在作怪^①。

胡适与周鲠生对苏联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多大的歧异。余英时先生指出，从1926年到1941年，胡适一直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1941年后，他才第一次把苏联社会主义与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相提并论，并认定其具有侵略性，与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并存。^②周鲠生的对苏态度则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早年他对俄国革命非常欣赏，认为“俄罗斯革命是近世政治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不但是根本的改换了俄罗斯政治社会组织的面目，变动了世界的政局，并且在国民政治的解放和改造事业上供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模型。”^③对革命后俄国所实行的反帝的外交政策，周鲠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苏俄总算是在列强中比较可以接近，比较不侵略的”^④。周鲠生对苏联的这种好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之后。在战争期间，周鲠生就表示相信战后的苏联尽管其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它仍会与西方国家合作，为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⑤周鲠生关于苏联并未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的判断，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

周、胡之间的分歧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立场，既是对国际局势的不同认识，也是对国内政局的不同认识。由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是防苏，它需要扶持日本，也需要扶持国民党政权。反过来，国民党政权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在国共内战的大背景下，批评苏联还是批评美国，就转化为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情中共的问题。当时周鲠生固然也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他反对“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能实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安定，如此

① 李大德：《同意周鲠生看法，胡适之有“恐苏病”》，《中央周刊》，第10卷第9期，1948年2月29日，355页。

②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25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③ 周鲠生：《俄罗斯的政治改造》，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编：《周鲠生文集》，17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④ 周鲠生：《解放运动中之对外问题》，66~67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

⑤ S. R. Chow,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p. 3.

“则苏联和平的政治的侵入自然失其效用”^①。因此他反对内战，反对武力解决的方式，这与胡适的立场是不同的。胡适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将使苏联在中国的势力增长，因此不希望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正如有学者所说，胡适藉着批评苏联，肯定自由民主的方式，以表达其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国民党的立场，意图是很明显的。^②

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周、胡之间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美国国内两种不同外交政策和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和主张，即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和以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外交。前者主张与苏对抗，后者主张与苏合作。

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盟友关系在战争结束后很快瓦解，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走上了与苏联对抗的道路。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F. Kennan）从莫斯科发出一份著名的“长电报”，声称苏联决心要在全球扩张它的权力，美国对此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③之后，凯南又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文章，明确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他宣称苏联“始终坚信资本主义腐败透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肩负着促其灭亡并将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的任务。”他认为在苏联的政治理念中，首要的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抗”的观点，“这观点业已多么牢固地嵌进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俄国的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莫斯科一方绝对不可能抱有任何关于苏联和据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有共同目标的真正想法。”他断言，“在可预

① 《周鲠生致胡适》（1948年2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23页。

② 参见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253页。

③ [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354～3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